

平等时代

缩小差距，开辟道路



201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

巴西利亚，2010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



UNITED NATIONS

ECLAC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this ECLAC publication



Please register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information on our editorial products and activities. When you register, you may specify your particular areas of interest and you will gain access to our products in other forma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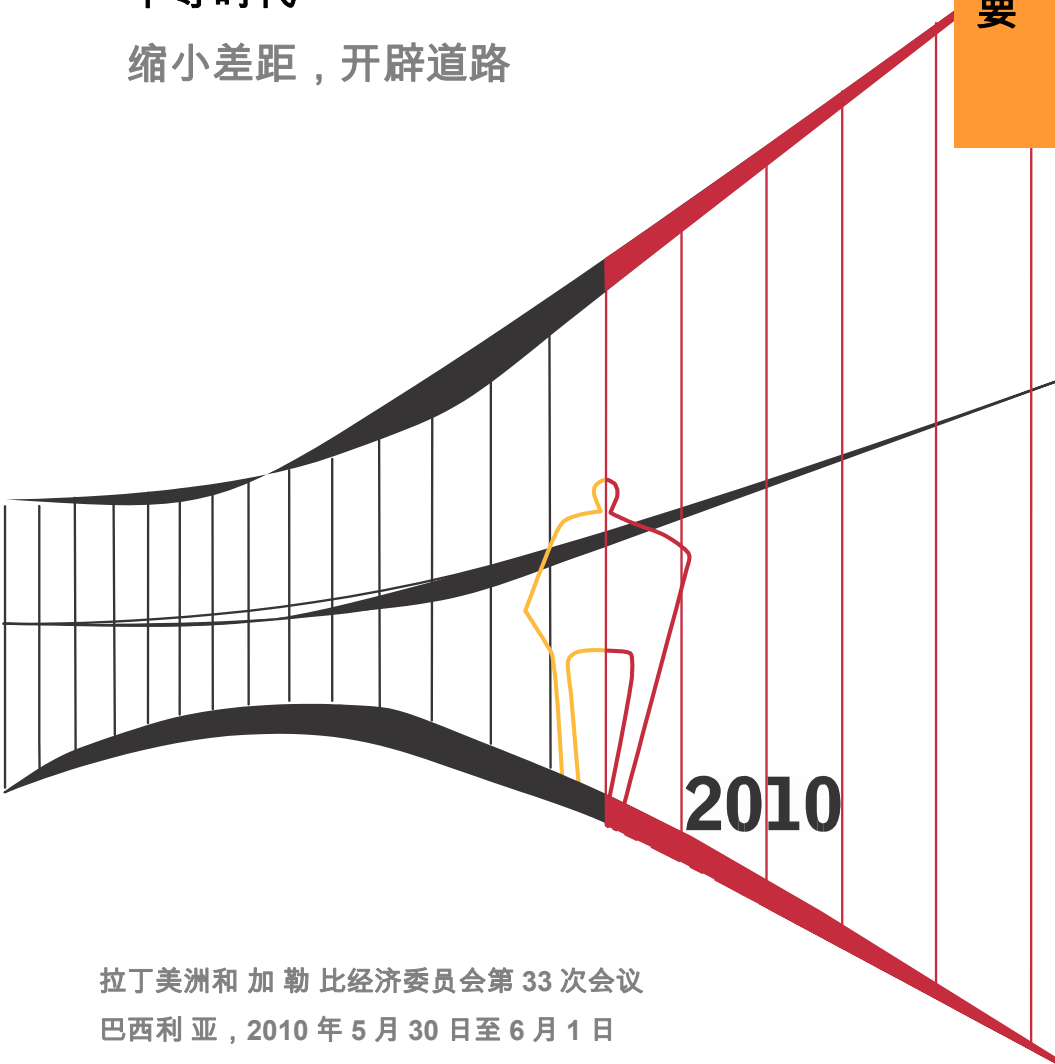
www.cepal.org/en/publications



www.cepal.org/apps

平等时代

缩小差距，开辟道路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第33次会议

巴西利亚，2010年5月30日至6月1日



UNITED NATIONS

ECLAC

本文为拉加经委会第33次会议 (巴西利亚 , 2010年5月30至6月1日) 文件《平等时代：减小差距，开辟道路》摘要，由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Alicia Bárcena、副执行秘书Antonio Prado和社会发展部主任Martin Hopenhayn共同编制。其他撰稿者包括拉加经委会工作人员 Mario Cimoli, Filipa Correia, Luis Mauricio Cuervo, Fernando Filgueira, Osvaldo Kacef, Sandra Manuelito, Iván Silva, Giovanni Stumpo, Daniel Titelman Jurgen Weller以及Ricardo Ffrench Davis 顾问。

本文未经正式编辑。

致谢

本文的翻译工作由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GTZ) 提供资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对此表示感谢。

目录

I. 制定全新发展道路.....	5
A. 历史转折点.....	5
B. 平等时代.....	7
C. 政府和政治行动.....	8
II. 平等发展议程：六大战略领域.....	11
A. 包容性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	11
B. 生产趋同.....	16
C. 地区趋同.....	24
D. 创造就业机会 提高就业质量.....	27
E. 缩小社会差距.....	34
F. 财政契约—实现平等的关键.....	43
III. 拉加经委会愿景和长期挑战.....	51
参考书目.....	56

I. 制定全新发展道路

A. 历史转折点

有观点称20世纪并非于2000年结束，而是结束于1989 柏林墙倒塌之时。该观点不无道理，柏林墙倒塌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同时构建了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新格局。发生这一变革的背景是新的生产范式得到巩固，科技知识不断积累，市场和国家间交往逐步全球化以及以上因素造成的激烈竞争。

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爆发债务危机。同一时期，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出现变革，并且建立了新的全球化格局以及以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和私人代理机构为特征的社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取消管制，全球经济和贸易步伐持续加快，由要素成本驱动的境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推出了两类措施：一类旨在通过政策调整保持稳定，另一类旨在缩小政府规模，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以上措施的后果是，目前该地区严重缺乏与促进发展、经济监管、福利津贴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相关的配套政策。这一状况也反映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差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亟待开辟的民主生活发展道路以及地区性生产滞后。为提供公共产品、保障社会安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就业机会，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然而，同时又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应在履行上述任务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这方面存在诸多市场限制。

当前的金融危机被视为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上一轮增长和经济繁荣周期结束，各国必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此次爆发于2008年的危机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此外，危机还引发各方就经济储备原理的发展前景、全球经济体系的运作标准以及公共政策和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激烈讨论。从经济周期角度看，此次危机导致由史上最大金融泡沫所支撑的全球经济繁荣戛然而止。危机由多个因素共同造成，其中包括严重的全球失衡状况、顺周期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国际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创新和全球化进程缺乏管制。这些因素决定了危机演变的趋势以及化解危机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困难。

总之，盛行于过去三十年的政府-市场架构已无法应对目前和未来的全球性挑战。目前的一大挑战是在着眼未来的前提下为政府合适定位。

B. 平等时代

为何要在制定全新历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强调平等价值？因为我们认为这一价值诠释了拉美和加勒比社会长期存在但一直未能实现的强烈愿望。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已持续五个世纪之久。此外，该地区还存在种族、民族和性别歧视现象，将公民划分为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收入分配极不公平。过去几十年间，不平等现象加剧了社会生产机会的失衡，导致就业环境恶化以及社会保障门槛不一。在全球化进程呈现非对称性的背景下，不平等现象愈加严重。

然而，不平等现象波及的范围越广，渴望平等的呼声就越强烈。在历史连续性突然中断、全球陷入危机、急需为未来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的背景下尤为如此。2008 年爆发的全球危机表明平等再次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价值。为了缩小差距，社会通过增强凝聚力减少不平等现象。平等权概念为各种旨在为穷人创造更多机会的社会契约提供了合适的框架和基础。财政契约旨在强化税制和税负的再分配效应，同时加强政府和公共政策在降低福利门槛以及在建立劳动者安全保护机构方面的作用。

在一个其发展道路能反映多数民众意愿的民主秩序中，会涉及到所有利益相关方，并体现平等价值。平等议程的另一个支柱是一套在长期愿景基础上得以执行的经济政策。这套政策涵盖生产、劳动力以及社会和地区发展等领域，旨在寻求平等机会，缩小经济差距。

社会平等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这方面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找到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我们的建议是为：争取平等而发展，为争取发展而平等。从长期战略角度看，应同时推进社会平等、加快经济增长以及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因此，我们建议缩小结构性差异，推动生产力发展，通过增强公众能力以及政府资源的流动性，最终实现平等。我们建议增强社会融合，建立积极的社会和地区协同网络，同时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转移体制和公共部门管理，加强社会保障，从而减小本地区的巨大差距。最后，在考虑平等价值以及如何在实现平等的同时保证发展等方面，我们不能忽视气候变化现象将对人类未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此，平等就意味着关注我们的子孙后代。未来，我们后代的生活状况将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面临自然资源短缺问题。

平等就意味着关注我们的子孙后代。未来，我们后代的生活状况将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面临自然资源短缺问题。平等还意味着要求国际社会就缓解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达成共识，以此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保贫困人口或穷国承担适当比例的气候变化成本。此外，平等还意味着在改善民众关系和环境状况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应当选择何种发展范式。

C. 政府和政治行动

就民众生活而言，构筑未来社会尚需假以时日。如果一个社会不进行自我教育，不在增强社会凝聚力方面进行投入，不创新，不建立共识，没有稳固的制度，这样的社会实现繁荣的机会将会微乎其微。

鉴于以上挑战，政府必须在进行战略管理的过程中放眼未来，同时制定合适的国家发展政策。必须记住的是，政府应在权利共享的环境中实施具体措施，从而确保通过谈判建立有关国家长期战略共识。为此，政府必须推进对话，而对话会赋予政府合法性，可以通过管理手段，在各个拥有明确社会经济目标的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调解，而这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加强自身的监管能力。

在政治领域，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的政治目标是改善民主和促进平等——堪称硬币的两面。就民主而言，政府必须通过两个途径努力提高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动水平：首先要有能反映各利益相关方广泛关切的战略议程，其次要在提供政策合法性和确保中长期政策有效执行的契约中充分表达民意。

在平等方面，政府必须着力确保发展成果惠及被边缘化的弱势行业。充分行使权力以及聆听民众声音，这二者是通过开展政策行动实现社会平等的有力保证。

政府政策必须涵盖以下方面：促进发展，提高生产率，加强全国协调，改善就业环境和劳工制度，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保护。所有政策均重点关注普遍性问题和再分配问题。我们建议应着重应对以上复杂而耗时的各项挑战。而要想实施以上建议，需要开展艰苦的技术工作，制定社会契约，落实发展所需的融资渠道。

这些建议主要解决三重挑战：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利用新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危机和制定新的发展道路，消除各地区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排斥现象。而这就意味着当前亟需改革税制和转移支付体系，从而增加收入，加强社会团结。针对以上挑战，我们建议关注六大战略领域。

本文未深入探讨气候变化主题，不过气候变化无疑将在国际议程和各国责任方面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本议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改变生产和消费模式，改变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并将减少碳足迹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一项主要任务。此外，鉴于全球面临的潜在威胁，必须尽快采取适当行动，有效处理有关代际沟通的伦理维度问题。在制定适应和减缓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对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土地利用和能源生产等领域进行长期的规划。而在这些领域开展工作，需要政府实施强有力的果断行动，进行长期投资，开展各种旨在改变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激励措施。

II. 平等发展议程：六大战略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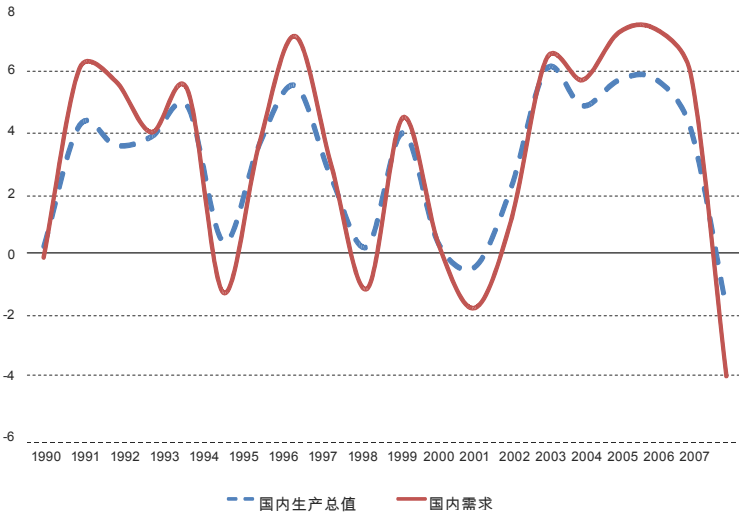
A. 包容性发展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能力实现更好更快发展，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应更加强健。与此同时，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包容性和社会平等，促进生产投资，创造就业，减少外部不稳定性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在这方面至关重要。

宏观经济环境从多个方面影响发展进程，包括投资率、价格稳定性、出口商品附加值及其与国内生产总值中其他部分的关系、创新及其在不同经济部门的应用情况、中小企业发展状况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一成不变或不稳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对以上所有变量均有明显的影响。

经验表明，通常受资金流量周期性变动的影响而变化的货币流动性、信贷率和汇率，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呈现出过山车模式。国民经济的总需求与资金流共同呈现周期性变化，导致经济活动和就业状况产生严重波动（见图1）。考虑到此类波动并非与充分就业同步出现，说明该地区的经济活动水平往往未能满足充分就业的需求，即在经济衰退期间会出现严重缺口。

图1
拉丁美洲（19个国家）：差距与总需求年度变量，1990-2009
(百分比)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R. Ffrench-Davis, *Reforming Latin America's Economies: After Market Fundament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实际需求与生产状况之间的差距水平具有显著的静态和动态效果。首先，该水平会影响生产率和项目可行性。其次，资本利用率的降低往往由平均就业率以及劳动力和实际资本存量的降低造成。第三，动态稳定水平对推动未来发展的措施具有多重影响。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萧条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率密切相关，该缺口反映生产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持续存在的萧条缺口代表对生产性投资所产生的抑制性因素。此外，由于对就业领域和小型企业具有消极影响，萧条缺口还会造成倒退或不平等现象。

以上消极影响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按“华盛顿共识”实施改革的二十年间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尽管在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强化财政纪律和实现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该地区GDP却未能实现大幅增长。

1990年至2009年，拉美地区（19个国家）人均GDP平均增长1.7%。而美国同期也保持了同样的增长率，表明目前两者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差距从1到4）。同一时期，全球年人均GDP增长率在2.0%左右徘徊，东亚地区（六个国家）年人均GDP增长率为4.1%。由此可见，东亚地区的宏观经济重心接近本文所建议的内容，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经验表明，随着全球经济不稳定性的不断加剧，政府有义务创造有利于增加生产性投资、推动创新以及扩大就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此，政府必须着力协调货币、汇率、财政和资本账户政策。以上所有领域均需要一系列连贯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战略必须力求挖掘经济潜力，保护经济发展免受外部不稳定性的影响，并且积极运用现有手段（金融、税务和外汇领域）增强经济实力。首先，为了减少经济不稳定性，挖掘发展潜力，必须完善对资本账户的监督。仅靠采取一般的保护主义措施或是干涉跨国资金流动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其他可采取的手段包括定量控制以及综合利用激励因素和抑制因素，根据流量类型、周期和规模确保外国资本的本土化和流动性。

第二，中央银行的资金实力和技术自主性必须要受到政府所实施的宏观经济协调措施以及敏感反映非金融经济成分指标的制度结构限制。近来，在各国央行的机制和目标中，通货膨胀通常被视为最重要的参数，其重要性高于发展、就业和生产性投资。

投资类型非常重要，因为中央银行和实体经济必须推动建立合适的生产结构，而这种结构应有助于逐步建立更公平的市场以及缩小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和不同社会出身的劳动者之间的生产率和收入差距。应在中央银行与规划、金融、工业和农业、林业和畜牧业之间进行有效协调，从而推动生产发展。

第三，保持财政平衡和反周期性需要增强国家财政能力，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增加税负。由收入和教育资金衡量的不平等与金融波动性、金融体系顺周期性以及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解决该问题需要旨在减少总体波动性和扩大财政基础的明确反周期财政制度，从而加大改善不平等现象的支出和社会投资倾斜力度。必须采取提高效率和市场分配潜力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此持续大幅改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

第四，必须根据以上重要目标制定货币和汇率政策。宏观价格应有助于加大投资力度，从而减小结构差异性，提高整个生产体系的劳动能力。

第五，设计和建立加强生产力发展的包容性金融体系需要采取一系列旨在管理风险、增加融资机会和延长投资回收期的手段。为此，必须着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时通过各种制度加强微型金融在各个层面的作用。现有资本市场的不完整性已严重阻碍中小企业实现长足发展。这是实现平等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为了改革资本市场，必须加强公众银行和开发银行业务发展，增强包容性，降低特别是投融资领域长期信贷等信贷领域的门槛。

简言之，“华盛顿共识”改革应加强金融体系与国内投资进程和国内经济而非外部金融市场的联系。改革还应有助于增强经济稳定性，避免汇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一致性，从而降低周期性波动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并防止实际利率长期为负或处于过高水平。

最后，应通过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的包容性融资机制分散经济权力。为避免总需求中不平衡现象加剧，必须不断微调宏观经济变量，从而通过适时运用反周期政策确定经常项目或汇率。以上措施可避免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大幅调整，此类调整往往涉及过度调整宏观经济环境下的价格和经济衰退，而这些因素会对实现平等产生不利影响。避免汇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一致性，从而降低周期性波动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防止实际利率长期为负或处于过高水平。最后，还应通过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的包容性融资机制分散经济权力。为避免总需求中不平衡现象加剧，必须不断微调宏观经济变量，从而通过适时运用反周期政策确定经常项目或汇率。以上措施可避免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大幅调整，而后者往往会对宏观经济环境下的价格和经济衰退进行过度调整，而这会对实现平等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可作为国民储蓄的补充，发挥有益的作用。资金流的构成和稳定性非常重要，有必要区分可创造新的生产能力的外国投资与纯属投机性质且具有很高顺周期性的资金流。不加区别的金融自由化对于实现生产发展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不起作用，并且不利于实现减少不平等现象的目标。本次全球危机便是不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之风险的一个例证，但它又使本地区国家有机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对资本账户进行反周期监管。

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公共政策。此外，各国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减少内外差距。在建立一套能够确保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系过程中，如何对国家资本市场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进行改革将是一个关键挑战。

毋庸置疑，政府必须在落实其宏观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努力在作用与反作用之间实现平衡。例如，如果汇率导致该国货币将大幅升值，虽然可在短期内提高实际收入的购买力，但在中长期内却会减少生产性投资。因此，宏观经济与生产发展之间的联系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并且产生各种选择。就此而言，宏观经济决策的制定过程归根到底都是基于政治考虑。

B. 生产趋同

就生产率而言，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两大差距。首先是技术差距，即该地区的技术实力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速度及在生产体系对其进行推广的速度远远高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对国际最佳实践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运用和创新的速度。其次是内部差距，即该地区国家各行业之间、各行业内部以及一个国家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这种差距被称为结构性差异，即企业各部门以及工人之间显著的不对称性以及劳动者集中在相对生产率很低的部门。

结构性差异是造成拉丁美洲社会严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生产率差距反映并拉大了能力、技术进步、议价能力、获得社会安全网保障以及职业提升选择方面的差距。与此同时，内部差距的拉大也导致外部差距进一步增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差距的大小。当生产率较低的行业难以实现创新、难以采用新技术以及难以推广学习新工艺时，内部差距将削弱其综合竞争力。这将导致贫困、增长缓慢、学习能力降低和结构难以改变的恶性循环。因此，必须同时减小这两种差距，保证发展更加强劲、更具包容性。

相比发达国家，拉美地区内部的生产率差距更大，这意味着该地区的收入差距比发达国家更大，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也更低。因此，行业生产率趋同（内部趋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缓解社会排斥现象。此外，为了缩小与美国的生产率差距（外部趋同），该地区应提高其竞争力水平，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减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

此外，通过缩小与美国的生产率差距，该地区还将在知识传播领域实现协同效应（改善生产能力和社会分配能力），并通过提高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提高政府执行能力，从而将资源和服务投向最弱势行业。

拉丁美洲内部各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就正规雇员数量而言，该地区生产率行业（采矿、电力和金融）所占份额很小，这一数字在1990年至2008年间几乎没有变化（从7.9%升至8.1%）。相比之下，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行业方面（工业和运输业），其正规雇员数量

的所占份额从1990年的23.1%降至2008年的20.0%，而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农业、建筑业、商业以及社区和人力服务行业），这一数字则从1990年的69.0%升至2008年的71.9%。

低生产率行业劳动者比例上升导致拥有少数先进技能的劳动者收入大幅增加，劳动者整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更加严重。相比之下，对美国行业生产率的调查显示该国行业差距较小。高生产率行业（电力和金融）的生产率是各行业平均生产率的两倍——明显低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此外，1990至2008年期间，以上不平等状况在美国逐步改善，而在拉美地区则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拉美地区与美国的高生产率行业之间的差距同期逐步缩小。换言之，拉美地区少数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正在接近国际水平，其他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则逐渐扩大，这一状况导致结构差异程度和不平等状况更加严重。

内部差距还体现在各类经济主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之间的差异方面。在拉丁美洲，小型实体类型复杂，包括微型企业和迅速发展的中型出口企业等。通过对拉美地区与发达国家此类企业进行对比可得出两个重要结论（见表1）。首先，拉美各国（大型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之间）相对生产率的差距远大于发达国家。智利微型企业的生产率仅为大公司的3%，而法国这一数字则为71%。

表1
各类实体与大型企业相比的相对生产率^a (百分比)

	微型企业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
阿根廷	24	36	47	100
巴西	10	27	40	100
智利	3	26	46	100
墨西哥	16	35	60	100
秘鲁	6	16	50	100
德国	67	70	83	100
西班牙	46	63	77	100
法国	71	75	80	100
意大利	42	64	82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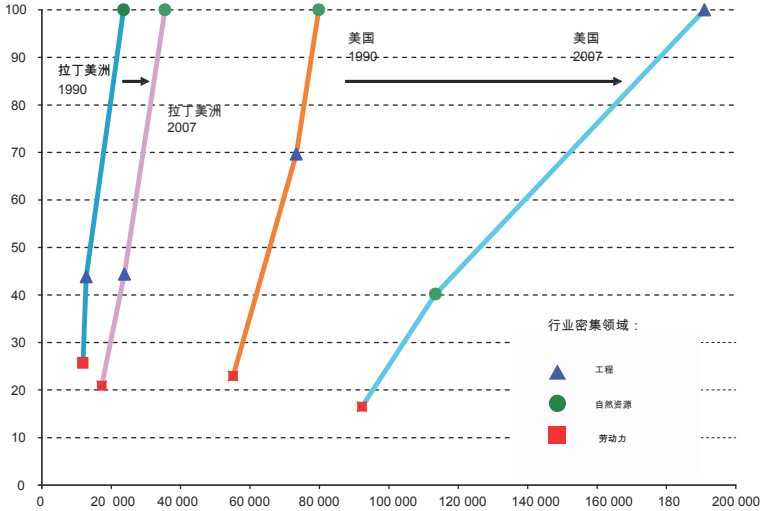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a 表内数字表示各类企业与大型企业对比的生产率。生产率数据和企业规模分类仅涉及正式经济部门，基于各国发展机构发布的相关信息（见Ferraro and Stumpo，2009）。

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拉美地区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地位愈加重要。这类行业凭借其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和生产率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领头羊。但这意味着总产量和总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该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长期存在。与此同时，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利用，技术密集型行业早已成为发达国家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中的主体。

在此背景下，尽管2003年至2007 期间拉丁美洲经济总体实现增长，但同期生产率却几乎未见上升，从而造成近年来该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生产率差距逐渐扩大。导致拉美地区生产率上升缓慢的原因有二：首先是该地区行业和企业多样性，这一状况意味着只有少数行业和企业实现生产率增长，其次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部门的专业化，此类部门几乎无力向其他生产部门推广先进技术（见图2）。

图2
 拉丁美洲与美国：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明细表
 (工业GDP百分比与1985定值美元)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基于产业业绩分析项目 (PADI)。

1990年至2007年期间，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显著拉大。从图2可以看出，拉丁美洲生产率（图中横轴）增长缓慢，远低于美国的上升幅度（拉丁美洲和美国的水平箭头显示生产率差距）。图2还显示，在这一时期，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仍在增加值总量中占据主要份额（纵轴），这类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幅度最大（横轴）。相比之下，美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增加值上升迅速，这类行业在生产率增长部分所占比例最大。

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能源需求和能耗不断攀升。这一现象产生了两个不利结果：首先，和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拉美国家单位产品能耗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整个地区未能缩小生产率差距。此外，单位产品能耗上升还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由于经济和社会原因，该地区生产和消费模式高度依赖化石燃料，造成能耗上升，同时形成了不可持续增长模式，从而导致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经济和贸易措施对这种发展模式实行制裁。

政府应通过积极提高生产率来缩小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并且形成更具活力的发展结构，以此推动经济增长和知识普及。由于存在结构性差异，内部生产率差距导致不平等现象加剧，而以上措施将缩小内部生产率差距。此外，政府还须制定公共产业发展政策，以此鼓励惠及生产率最低行业的技术创新和融资，加快发展中小企业。政府应通过加强与生产企业之间的协调，缩小能耗方面的差距，同时鼓励可持续性更高、碳排放量更低的生产和消费行为。

因此，我们建议通过三类相互关联的政策改革生产结构：(i)产业政策，重点是最具创新能力的行业（以此缩小行业内部差距）；(ii)技术政策，以此普及技术知识，并满足创造和推广技术知识的需求（同时借此缩小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外部差距）；(iii)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此减小企业在价格信号响应能力方面的不对称性（同时缩小生产企业之间的差距）。

但是，在一个相互矛盾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中无法协调与整合以上三类政策措施。例如，旨在实现通胀目标的宏观经济手段会严重削弱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用。现有资本市场的不完整性已成为众多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难以克服的障碍。

设计和建立一套为生产活动提供融资的包容性金融体系需要广泛采用风险管理、增加融资渠道以及延长融资期限等各类手段。这是在保证平等的同时实现发展的基本策略——如前所述，必须重点关注资本市场，并大力发展公众（或开发）银行，以此降低信贷门槛。

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根据实力大小（基于各国生产结构的具体特征）确定出关键行业，从而创造和推广知识与创新成果，同时加强这些行业与其他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联系。产业政策应重点关注此类行业。

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必须采取干预措施，为多数企业提供信贷和人力资源等基本“投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成功提高生产率的同时缩小了与其他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这些企业更容易加入大公司的供应链，并组成企业网络，而这将与产业政策产生协同效应。

确保中小企业实现发展、稳定以及较高的生产率和利润率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同时向这类企业优先划拨财政资金。中小企业在发展和平等战略中应占有中心地位。通过制度改革，政府应能够采取手段解决经济主体在获得信息、信贷和技术方面的不对称性问题。

技术政策将在以上战略中起到两个关键作用，首先是在相关战略行业的大中型企业中推动创新技术，其次是通过中小企业采取干预措施鼓励在最落后的公司中传播知识和技术。将不同活动领域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该过程涉及

因为该过程涉及各种制度（部门、技术、金融及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发展路线和目标各不相同。因此需要设定一个确立优先目标的战略议程。只有在这些目标方面达成共识（在公共和私有机构以及整个社会中），同时明确政府的领导职责，才能实现以上目标。

为了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行业，同时打破自然资源导向型要素禀赋导致的恶性循环，政府应在相关生产结构和经济主体内实施新的制度框架、税收制度和战略。如果金融行业能够进行长期融资和规划，便可确保对知识导向型行业的投资稳步增加，并且提供创新资源。此外，该行业还能够大幅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规模，以提高此类企业的生产率，并加强其与大型企业和市场的联系。最后，实力雄厚的金融行业应重点为旨在推动创新以及整合高校和私有部门相关倡议计划的项目提供融资，并将其作为自己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此外，政府可利用各种手段加快社会生产发展步伐，例如各行业的技术资金、财税征收，包括税收提取活动或战略资源的公有制，以及旨在为重点出口行业或参与跨国链活动的行业提供支持的各类贸易和财政手段（税收和选择性税收减免）。

最后，必须承诺在中长期内大幅增加针对研发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应根据实际生产状况调整生产能力，并且为经济交流和创造财富的平台提供保障，否则无法消除发展瓶颈。

若未实现以上目标，则无法使因国际相对价格结构变化而形成的增长周期实现产量和生产率方面质的飞跃。

尽管如此，本文中的建议还指出应根据政府决策划拨和发放补贴，但其所需的财政和制度承诺难以长期维系。政府可向私有行业授予补贴，但前提必须是确保补贴对公共价值产生的回报高于最初成本。虽然对政府补贴的接收者进行约束和惩戒就是件难事，但在20世纪，还从未有在缺少以上政策的情况下仍实现显著发展的实例。

C. 地区趋同

实现生产趋同需要缩小与竞争力更强的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和内部结构性差异。地区分化反映了——并在部分程度上造成了——此类社会和生产率差距，因此可准确“画出”此类差距。空间不对称性表明并拉大了此前讨论的内部和外部生产率差距，由地区分化所引起的基础设施问题妨碍了各国内部相互联系。一国不同地区之间在收入、贫困程度、生产率以及实现富裕机会方面存在的差距导致了此类指标在国家层面上的差距。

一国最富裕地区与最贫困地区之间在人均 GDP 方面的差距可有力说明以上问题。拉丁美洲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关国家之间的对比¹显示经合组织国家最富裕地区的人均 GDP 仅为最贫困地区的两倍（平均数不到 1.76 倍），而拉美国家这一数字已超过八倍（例如阿根廷和巴西东北地区经济基础极为脆弱，远远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

¹ 此次调查由拉加经委会实施，涉及下列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和下列经合组织国家：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韩国、西班牙和瑞典。

因此，缩小地区差距是平等议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未来制定的政策必须同时覆盖生产趋同和空间趋同两个领域。

就宏观区域而言，地图显示在南美洲安第斯和亚马逊地区18岁以下的人口中，88.8%处于赤贫状态。墨西哥和中美洲赤贫人口的地区分布显示，该地区与安第斯和亚马逊地区一样，弱势地区分布广泛，而最贫困地区往往居住着大量土著人口（例如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南部）。

营养状况最差的儿童主要生活在中美洲高山地区以及安第斯高山和高原地区，其中主要是土著居民，其母亲未接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甚至未接受过任何教育。这类人口处于赤贫状态，缺乏饮用水和卫生服务资源。

在城市，特别是拥有众多卫星城市的大都市，地区性差异表现为城市内部的居住隔离现象。城市居民交通成本高昂，难以获得住所和网络，由此结构性差异明显与劳动力市场分化有关联。居住隔离指城市或大都市内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各自单独居住，基本或完全没有共存状况。由于贫困人口多数在郊区生活，并且郊区的贫困状况较为严重，郊区的不安定性已成为拉丁美洲城市隔离的显著特征。这方面的总体趋势是，在教育水平低下以及拥挤程度、失业率和未成年人怀孕率较高的地区，贫困程度也较为严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大量人口居住在城市。以上状况导致这些城市陷入贫困和边缘化程度日益严重的恶性循环。

由于地区发展涉及众多主体，因此必须针对地区凝聚力制定相关契约，以便集中力量推进地区和地方均衡发展。消除地区不平等现象，同时也意味着需要将更具活力的行业引入贫困地区，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

若改善地区不平等现象的战略焦点是成立地区凝聚力基金，则政府必须在该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地区凝聚力基金在此至少有三大用途。首先，将基金从中央转移至地方，同时承诺通过使用这些基金，在生产、能力建设和消除贫困人口之间产生协同效应。其次是通过转移支付或交叉补贴的形式进行再分配，这一方法与利用所得税将资源转移至贫困人口或向其提供服务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地区凝聚力基金应作为协调行业和空间发展政策的工具，避免贫困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推广更多一体化干预形式。因此，作为行业间的规划手段，地区凝聚力基金适用于因行业权力分散而导致诸多差距的地区。

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以及国家与地方或地区政府全面协调制定的地区发展政策在缩小地区差异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地区发展进行融资以及地区差异的消除，必须以改善税收制度等地方政府财政措施以及根据广泛征求意见后制定的发展计划实施的转移制度为基础。

应积极吸纳所有利益相关方（公私两个领域，包括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城市隔离背景下的可持续管理工作，其中应采取新的管理方法，例如(i)行业间规划手段整合，(ii)各级政府垂直整合，(iii)公私合作伙伴关系，(iv)公民社会参与。

对于城市而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由市政当局提供基本服务。在融资机制依赖当地税收的城市，基本服务严重不公平，导致贫困人口状况恶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政府可能通过直接的政策杠杆措施，消除因居住隔离而迅速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包括地区税收再分配基金、资源补偿、区域分配以及面向弱势地区的特殊项目等。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城市 and 住房政策不应局限于覆盖和提供基本服务。此类政策必须提高低收入行业的购买力，使其能够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同时应鼓励将补贴用于无须增加土地用量（例如通过提高土地密集程度以及购买现有住房单元）的解决方案。其他方案包括：要求建筑公司通过竞标获得各地区现有项目的社会住房合同，以及授权负责选择项目的机构，由后者遴选社会成本最低而非财务成本最低的方案。

D. 创造就业机会 提高就业质量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的 not 平等现象。该地区多数家庭的物质财富主要由就业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劳动力收入所决定。适龄工作人口在其能力发展方面的不平等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行业不平等机会——严重影响了财富分配和社会凝聚力。此外，财富分配和社会凝聚力还反映了不同劳动力群体在收入及获得社会保障机会方面的差距，这方面的差距由教育、经验、性别、居住地区及其他因素所决定。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就业人口的技术水平各不相同，导致该地区工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过去十年间，这一差距不断拉大。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有技术变革、国际贸易、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问题，例如最低工资的下降或冻结以及工会作用的削弱。过去六年间，工资差距似乎再次略微缩小。相比技术水平最低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就业人口的相对收入有所下降，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仍未达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受过中等教育以及最近十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数量的上升导致该群体相对收入下降（见表2）。

在生产结构极不平衡的背景下，各行业的就业状况存在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收入、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以及职业稳定性等方面的显著差距。如前所述，产生该状况的部分原因是不同生产行业的生产率存在很大差距。此外，该状况还反映出劳动力就业制度和社会制度仅覆盖了部分劳动人口。其余劳动人口集中在庞大的非正规行业，这部分人口在整个地区经济活动人口中占很高比重。非正规行业缺少劳工制度保护，其劳动人口的就业状况极不稳定，收入低下，并且缺乏社会保障。即使在正规企业内部也存在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口，其原因是这些企业通过采用分包策略降低成本，同时无须保障分包工人享受所有权利。

表2

拉丁美洲：城市就业人口（每周工作35至45小时）的相对劳动力收入，基于教育水平和性别^a
 （15个国家的简单平均值，9-12年受教育年限 = 100）

	受教育年限	就业人口			工薪阶层		
		总计	男性	女性	总计	男性	女性
1990年左右	8年以下	70.1	71.5	62.4	68.1	69.4	60.7
	9-12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2年以上	182.2	193.0	165.6	177.5	190.6	162.6
2000年左右	8年以下	68.4	68.7	63.0	69.0	69.5	63.2
	9-12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2年以上	215.5	229.0	206.3	205.7	219.0	196.8
2006年-2008年	8年以下	70.0	70.9	63.8	72.6	72.6	68.6
	9-12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2年以上	197.7	206.2	195.9	193.3	205.0	189.2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基于根据在各国进行的家庭调查专门编制的表格。

^a 为了减少妇女平均工作时长较短（兼职情况下，小时收入高，总收入低）产生的双重影响，计算结果仅限于“中等时长”的工作日，不包括外部价值。

20世纪90年代，低生产率行业的就业人口数占城市就业总人数的份额从1990年前后的47.2%升至2002年前后的50.8%，到2007年前后又降至47.4%²。初步数据显示，在2009年经济低迷期间，原本有所改善的就业趋势重新陷入停滞。不同生产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也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生产行业新增就业数量相对较低的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前后，微型企业的平均工资占其他类型企业平均工资的比重从73%降至62%。个体劳动者（不含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收入占各类企业平均收入的比重则从99%陡降至73%。随后几年，正规企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及这些企业新增的就业岗位均有增加，以上差距不再增大，而是略有缩小：微型企业的平均工资占其他类型企业平均工资的比重升至66%，个体劳动者的收入占各类企业平均收入的比重则升至75%。³

² 根据拉加经委会2009年统计附录表18计算出的15个国家简单平均值。

³ 基于各国家庭调查相关数据。

妇女、少数民族和年轻人的就业状况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并且缺少监管。长期存在的歧视现象造成职业分化现象——水平和垂直——即能力相当或承担类似责任的劳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和收入大相径庭。就妇女而言，这些不平等现象部分反映了其繁育后代的社会角色、财产差距、以男性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歧视妇女的体制。

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改革劳工制度，进而使其能够不断实现自身目标是一个重大挑战。虽然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可在短期内增强其调节能力，但是容易造成涌现大量短期雇工，并加剧职位不稳定性。就业稳定对于开发新知识 新技能以及推动生产率提高不可或缺。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非常重要，这些知识和技能反映了就业稳定性与企业对员工综合知识和技能的投入之间的正相关性。为了保证效率，劳动力市场必须具备短期适应能力和长期的高生产率。

在制定有关劳工制度政策的过程中应以史为鉴，具体包括(i)历史上没有通过增加灵活性的劳动力改革从而实现持续增长和平等的先例，(ii)资本积累的过程可能要求在收回持续投资后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制度改革，而这一因果顺序可使改革更多地顾及劳动者利益，(iii)投资回升状况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复苏程度，反之则不成立，以及(iv)过度的“改良主义”或会延误投资，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其原因是企业管理者若认为项目价值将逐渐减少，他们可能会推迟项目实施时间。由于以上原因，最佳方案是通过采取宏观经济措施（利率或汇率）以及特定的关税和生产政策鼓励投资，同时在必要情况下进行劳动力体制改革。

必须采取多种手段方能在增加劳动力市场包容性的同时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现象。以下路线图介绍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应重点采取的具体措施。

- (i) 完善职业培训和辅导的工具和手段，以满足不同劳动力群体需求。扩大培训体系范围，纳入新入职员工培训和老员工在职培训或再培训。为小企业开展培训提供更多激励措施，增加生产企业员工培训补贴，扩大弱势群体参加培训项目的机会。最后，将培训体系纳入长期发展战略，不断提高整体竞争力。
- (ii) 加强集体谈判，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制定合理的劳资和社会契约，增加劳动者利益。增加工会组织开展活动以及集体谈判的机会，根据新的经济环境来调整相关劳动法规。在调整过程中，应征求所有利益相关方意见，调整方案时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确保适当的谈判范围，并设立享受权益的最低门槛。鉴于本地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多个国家工会组织在生产领域的困难处境，采取以上措施极为必要。

制定劳动力契约的目的是完善劳工机构的职能，使其更好地履行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就业岗位的双重职能。扩大劳工机构的保护范围，覆盖不断增加的适龄工作人口，进一步减少不平等现象。确定劳动力协议内容期间必须进行社会对话，分析阻碍劳工机构履行职能的具体瓶颈。为制定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劳动力保护状况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政府、雇主团体和工会之间在哪些方面可以达成有效的口头让步。

- (iii) 根据各国工资结构的具体特点，确定适当的最低工资标准。
- (iv) 完善行业劳资关系，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必须确保一般劳工权利。目前，本地区已有数个国家通过制定有关分包和在家工作条件的规章制度，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
- (v) 通过采取生产发展手段和非缴费型社会保障机制，改善非正规行业员工境况。本地区数个国家的经验表明，必须明确劳工利益（例如通过企业发展计划），并将劳动关系正规化的成本降至最低，否则正规化带来的收益将无法广泛惠及非正规企业。需要避免允许根据企业类型确定不同劳工权利的合法存在，从而使促进劳动关系正规化的计划进一步加剧分化的现象。然而，此类计划有助于建立促进正规化以及基本劳动状况标准化的临时机制（Tokman, 2008）。鉴于本地区多数国家在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在劳动关系正规化的过程中，可扩大参加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缴费人群范围。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加强发展基于社会转移支付的非缴费型制度。
- (vi) 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弱势群体找到理想工作。制定协调妇女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政策，减少其在劳动力市场准入和就业环境方面与其他群体的差距。提供看护服务（以社区或市场为基础，或者由政府提供），以此扩大儿童社交面，并为妇女提供更多工作时间。其他措施还包括：针对工作时间、弹性工作制和远途工作签订具体协议，紧急事假，

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弱势群体找到理想工作。制定协调妇女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政策，减少其在劳动力市场准入和就业环境方面与其他群体的差距。提供看护服务（以社区或市场为基础，或者由政府提供），以此扩大儿童社交面，并为妇女提供更多工作时间。其他措施还包括：针对工作时间、弹性工作制和远途工作签订具体协议，紧急事假，鼓励男性提供更多看护服务并为其提供便利，同时将该议题纳入集体谈判过程，从而为特定行业或企业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为了向年轻人提供更多理想就业岗位，必须通过教育体系提高其整体素质，同时完善培训和劳动力中介服务。

- (vii) 针对高度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人员，建立完善保护机制。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此类被动性政策与主动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相结合，此类机制还会提高求职效率。本地区只有少数国家制定了失业保险制度。尽管声称资源匮乏乃是一大障碍，但如今已有一些人均收入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当前普遍水平相当甚至比其更低的国家，已实行上述方案，并开始建立起覆盖范围广泛的失业保险制度（Berg and Salerno, 2008）。任何情况下，有关部门均应认真制定失业保险制度，从而在不产生过高成本的前提下，为失业人员提供有效保障。解雇补偿和失业保险不可相互替代，应将这两种制度有机结合，从而有效实现各自目标。

因此，必须调整劳动人口经济安全（涉及收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技能培养、工作环境和代表权以及职业安全（ILO, 2004a））的不同部分。保证调整措施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同时考虑各国长期发展战略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在收入保障、劳动力市场保障和就业保障中必须确定优先顺序。

E. 缩小社会差距

1. 不平等与福利政府

主张平等的公共议程不应局限于机会平等，而应扩展政府职能，以获得更加平等的结果和福利水平。因此，政府和公共政策应在消除市场和家庭不平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政府在缩小福利差距方面可采取多种措施，包括通过增加社会支出、加强社会制度能力建设改善治理和收入转移制度，这些举措对进行再分配具有显著效果。

自20世纪80年代达到历史最差水平以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在1990年至2002年期间仍严重不平等。1980年至1990年，社会政策对解决该问题几乎未起到任何帮助，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法规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补缺型的社会福利模式，这种模式对财政资源的分配极其有限。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支出无疑已上升为宏观经济和国家财政应予优先考虑之要务，但直到90年代末政府才开始重新制定公共政策，以反映政府在防止家庭收入损失、收入贫困和收入免税方面重要的公共承诺。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五个政策领域。

(i)直接收入转移至最贫穷的部门，提高覆盖率和质量，由国家财政拨款，以公民权利为原则。

(ii)政府对社会安全网、社会资本和能力建设网络进行统一协调。

(iii)实行非缴费型或补贴制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

(iv)政府在解决因分权管理而恶化的不对称性和不平等现象以及对准市场或私人供应商放权等问题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v)将新的行为领域纳入公共议程，或从性别角度重新关注现有与保健工作相关、与有偿及无偿工作的协调和再分配相关的领域。

这些“改革中的改革”不应因金融危机和国际新局势而停顿。相反，针对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社会成本，政府应更加积极地发挥国家职能，并为改革提供有力支持。因此，金融危机代表的不仅是威胁，更是一剂触媒，它促使各界对社会政策改革达成广泛共识。为应对挑战，应了解界定福利差距的各种参数和政府行为的可能性。下表显示了该地区不同国家的参数差异。

表3
拉丁美洲（国家组别）：
所选福利指标^a

	组别 I	组别 II	组别 III	拉丁美洲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 乌拉圭	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 哥伦比亚， 墨西哥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 马拉，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巴拉圭， 秘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2008年人均收入（美元，2000年价格）	6 601	5 320	1 975	4 074
2005年 - 2010年人口负担系数 ^b	52.9	54.8	68.3	60.9
2008年贫困人口（百分比）	19.7	35.1	52.1	38.4
2008年贫困人口	6.7	14.7	26.8	18.1
2008年非正式行业就业率 （占所有就业人口百分比）	41.6	55.3	65.3	55.7
2007/2008年税收负担（含社会缴款，占GDP百分比） ^c	24.8	13.7	16.4	18.7
2007年 - 2008年人均社会公共支出（美元，2000年价格）	1 209	619	181	597
2007年 - 2008年社会公共支出（占GDP百分比）	18.6	11.8	10.2	13.3
城市地区退休金覆盖率（百分比）	64.4	26.6	14.1	33.0
医疗支出	23.3	35.1	72.1	49.7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基于在相关国家进行家庭调查获得的特别数据表。

^a 该组别国家的简单平均值。

^b 负担系数 = $(0 - 14\text{岁人口} + 65\text{岁及以上人口}) / (15 - 64\text{岁人口}) * 100$ 。

^c “总值”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指一般政府，在其余各国指中央政府。

福利差距较小的国家GDP较高，人口负担系数较低，非正式劳动力市场较小，公共医疗覆盖率较高（付现费用比例较低），贫困程度较低，社会公共支出的人均总额和在GDP中的比重均较高。在欠发达国家，以上所有指标均显示情况愈加严峻。因此，就社会需求和财政能力而言，福利差距变化明显。欠发达国家具有以下特征：劳动力市场不稳定、家庭负担重、人口负担系数高、匮乏的财政资源难以满足众多贫困人口和公共机构，管理和落实措施的能力低。

2. 收入转移：直接再分配与基本保险

社会不平等现象严重和平均生产率低下的结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上述大部分国家的大多数人口无法创造最低收入。导致个人及家庭收入缺口的基本原因有三：失业、低工资和缺乏积极性（最后一点归因于各种障碍而非福利不足）。这种情况需要通过基于非缴费型机制的收入直接再分配及其他措施解决。

有充足理由建立一种保证部分收入的基本制度，加强财政责任以及避免不当动机。因外生冲击或个人因素（如重病）而面临紧急情况的贫困及弱势家庭之所以会发现其财产受到与冲击影响不成比例的侵蚀正是由于他们缺乏最低保障或至少能够在经济窘困期间走出收入低谷的工具。避免代表多数拉美人口和该地区主要生产基础的经济体的崩溃，从现实角度来说其必要性不亚于避免金融体系的垮塌（通过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更遑论从道德角度。此外，该地区缺乏针对危机和冲击影响的自动稳定机制，因此建立基本收入保障制度便成为困难时期维持国内需求的一个途径。最后，本文所提建议及目标人口选取旨在加快有幼童家庭尽早脱贫，从而促进人口全面转型地区的人力资源能力发展，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以下模拟情景将等于1倍贫困线（某些情况下为0.5倍）的数值分配给按照所选标准符合资格的个人，并计算出新的家庭收入以及相对于GDP的总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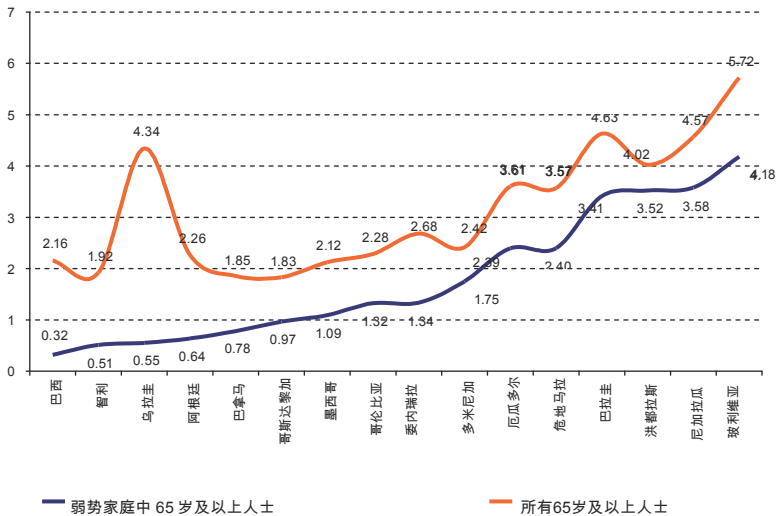
评估包括以下四类受益模式：(i)给予5岁以下儿童1倍贫困线的分配值，(ii)给予5 - 14岁儿童0.5倍贫困线的分配值，(iii)给予65岁或以上人士1倍贫困线的分配值，以及(iv)给予失业人士1倍贫困线的分配值。各模拟受益模式分别分成两组：所有符合资格特征的人士（通用组）以及除符合资格特征外生活在收入低于1.8倍贫困线家庭的人士（目标组）。假设建立这一转移数组的财政资源随时可用，不同国家适用同一比率，并且公共机构始终有能力以最有效的方式运用这些财政资源。然而很明显的是，这些为应对福利和社会进步挑战所作的财政努力需要经济发展、公共支出再分配以及政府财政能力的提升。

在福利差距较小的国家，不同目标组甚至所有通用组模拟转移所需数值均需较大努力，但只要合理规划，假以时日目标并非无法实现。例如，若以较低覆盖率或受益水平为目标（如模拟情景原先确定的受益水平的一半，图中底线），财政努力仅占GDP的1.5%。对于福利差距适中的国家，所需数值范围在最经济的情况下占GDP的2%至5%。在福利差距较大的国家，以上挑战更为严峻，财政努力在基本情景下将高达GDP的6%至9%。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和社会需求，有必要对众多选择进行优先排序。尽管如此，努力为有幼童家庭提供基本收入保障特别重要，因为采取该措施不但成本最低（尤其目标定位经过调整时），而且对个人能力作用最大。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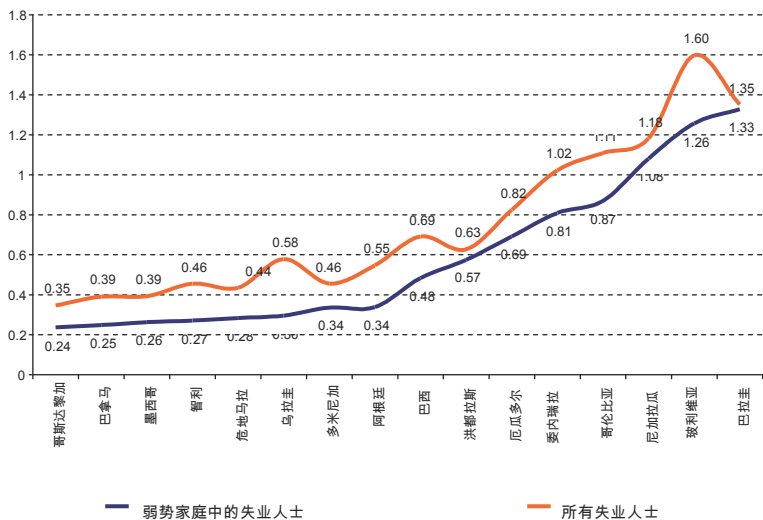
基本转移成本占GDP百分比

拉丁美洲 (16国) : 向5岁以下儿童转移1倍贫困线的成本, 2008年 (占GDP百分比)

拉丁美洲 (16国) : 向65岁及以上人士转移1倍贫困线的成本, 2008年
(占GDP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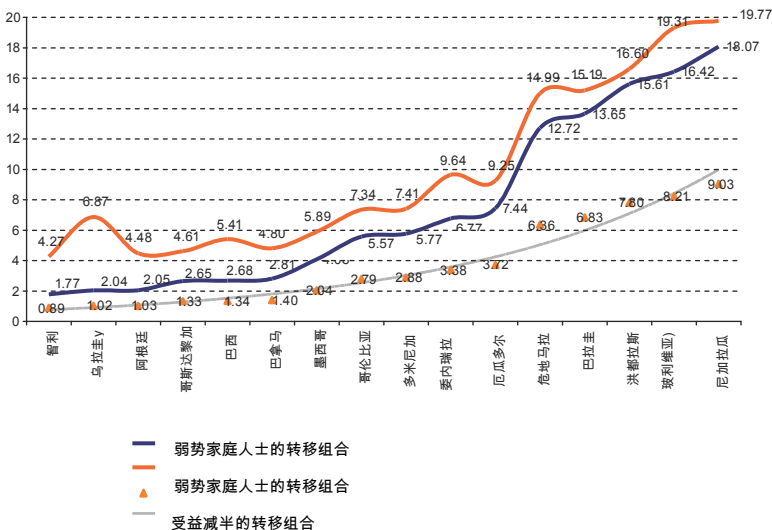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16国）：向失业人士转移1倍贫困线的成本，2008年

(占GDP百分比)



拉丁美洲（16国）：所有收入转移的成本、弱势家庭数和家庭总数

(占GDP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基于在相关国家进行家庭调查获得的特别数据表。尼加拉瓜为2005年数据，阿根廷、危地马拉和智利为2006年数据，洪都拉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为2007年数据。

最后，如表4模拟情景所示，这一转移数组对减贫和收入分配影响巨大，在第三世界国家、相对欠发达国家和贫困率高、社会保障体系脆弱、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国家尤甚。

表4
基本转移对贫困和社会公平的影响

	覆盖率 (占家庭总数百分比)	转移前 贫困率	转移后 贫困率	贫困 减少程度	转移前 基尼系数	转移后 基尼系数
阿根廷	30.2	14.737	6.692	-8.0	0.52	0.48
玻利维亚	59.26	47.224	29.2	-18.0	0.58	0.48
巴西	32.4	19.872	11.167	-8.7	0.61	0.58
智利	28.66	11.258	4.479	-6.8	0.54	0.51
哥斯达黎加	33.48	14.836	5.877	-9.0	0.49	0.45
厄瓜多尔	56.94	36.529	18.079	-18.5	0.52	0.44
危地马拉	65.58	46.69	26.721	-20.0	0.59	0.50
洪都拉斯	72.94	63.102	44.119	-19.0	0.58	0.46
墨西哥	49.12	27.918	13.029	-14.9	0.54	0.49
尼加拉瓜	70.34	54.418	34.621	-19.8	0.55	0.45
巴拿马	73.26	21.457	9.894	-11.6	0.52	0.47
巴拉圭	64.59	50.182	29.203	-21.0	0.54	0.45
多米尼加	50.12	40.122	23.64	-16.5	0.58	0.50
乌拉圭	23.04	8.496	2.639	-5.9	0.44	0.41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基于在相关国家进行家庭调查获得的特别数据表。

社会投资应通过长期反周期政策投向低收入群体，此类政策能够抵消偶然波动，提供有效保障和可靠的质量水平。社会保障和杠杆机制因此成为一种具有多方面作用的重要选择，但只有金融安全和制度稳定取得重大进步后才能建立上述机制。此类机制必须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予以巩固。

3. 教育水平

教育对于实现平等至关重要。若教育领域的差距缩小，不平等现象将可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得以减少。

新一代将为投入劳动力市场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社会资本将会更容易获得，儿童营养不良和未成年人怀孕的风险——代际排斥的重要媒介——将会降低。

促进平等的公共议程中教育方面的优先事项应包括扩大学前教育的覆盖范围、延长公立学校的教学日、提高薄弱社会经济行业的中等教育普及率（考虑到现在初等教育已基本普及）、缩小从学前教育到中等教育全过程存在的教学 and 知识差距。

接受学前教育有双重目的。首先，学前教育在教育生涯开始阶段消除了学习能力的差距，这一阶段对日后的教育成果具有重大影响。在公共制度中保证学前教育可消除家庭背景的差异，促进学习机会平等。其次，增加学前教育覆盖范围，例如延长教学日，减少了成年人特别是妇女照看子女的时间。这将提高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有助于增加家庭收入和促进男女平等。

尽管该地区很多国家都把完善教育的政策提上日程，但是若要使早期教育和学前教育作为两性平等分担看护义务和儿童平等分享机会的重要方式还需做大量工作。学前教育在3 - 6岁儿童中的覆盖率呈现高度分层状态，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与家庭收入水平成正比。在覆盖率较低的地方，贫困家庭或者挣扎在贫困边缘家庭的儿童便失去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

中等教育普及率对实现社会包容具有重要意义。拉丁美洲地区中等教育普及率极低（51%），导致该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根据收入五分位数确定的中等教育普及率差距：在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青少年中，五分之四受过中等教育；而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青少年中，该数字仅为五分之一。

最后，教育差距还反映在教学成果上，私立学校的学生比公立学校的学生成绩更好。这意味着教学质量水平取决于家庭支付学费的能力。学生的学习成绩还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则直接影响家庭收入。所以，供求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出现知识和技能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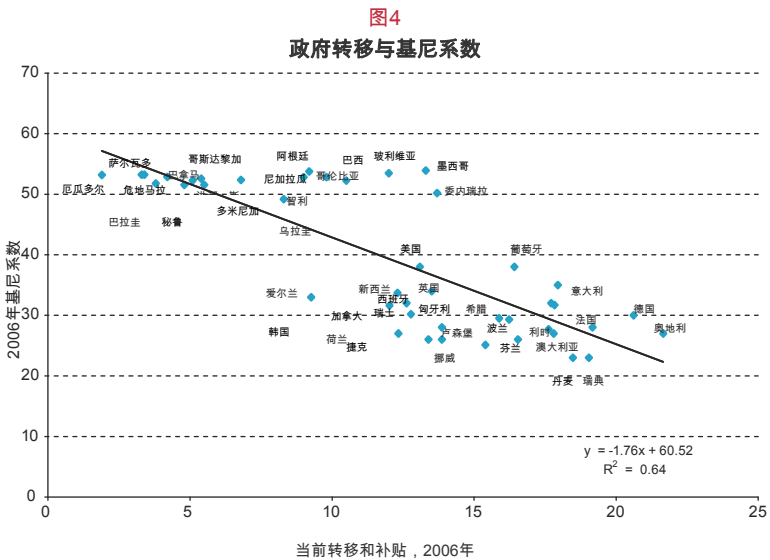
F. 财政契约——实现平等的关键

1. 平等、转移和税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与欧洲对比情况

出于前述考虑，应集中关注在该地区政府当局可利用的资源。作为一种重要机制，税收有利于提升政府的财政能力，使其能够在推动发展和实现社会平等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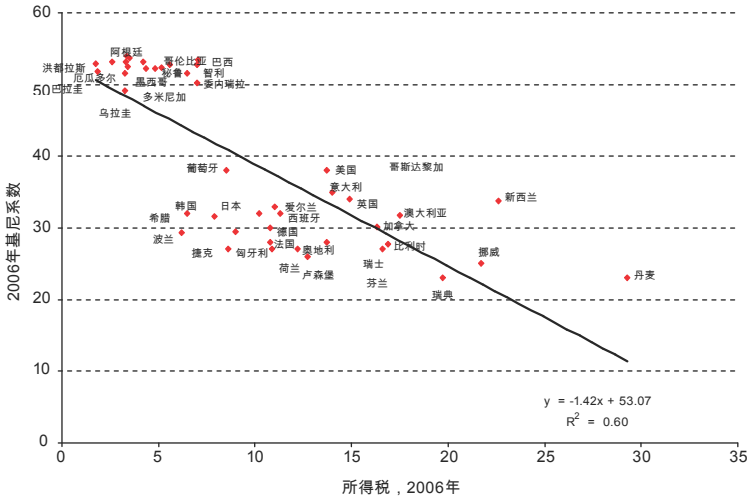
相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税收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实现社会平等的作用较小。部分原因在于该地区极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和公共产品的质量。政府应发挥其在收入和公共支出再分配过程中的应有作用，而这一任务仍有待落实。政府通过财政转移和确定税收水平及结构等方式进行的直接干预对贫困状况和收入再分配具有重大影响。在经合组织国家，税后及转移后的基尼系数预计下降约0.15%（相比税前及转移前水平），而在拉丁美洲仅略降0.02%。

阐述分配效果的另一个方法是直接评估对基尼系数影响重大的变量的作用，特别是社会支出和税收结构（见Alonso, Schuknecht和Tanzi（2008）关于经合组织国家的著作）。在拉丁美洲国家应用这套方法产生的结果非常相似（Gonzalez与Martner, 2009）（见图4和图5）。



资料来源：Ivonne Gonzalez与Ricardo Martner, “Del síndrome del casillero vacío al desarrollo inclusivo: buscando los determinantes de la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en América Latina”,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2010年1月26日-29日于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十二届财政政策区域研讨会文献。

图5
所得税与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Ivonne Gonzalez与Ricardo Martner, "Del síndrome del casillero vacío al desarrollo inclusivo: buscando los determinantes de la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en América Latina",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于2010年1月26日-29日举行的二十二届财政政策区域研讨会文献。

上图清楚地显示，一方面，平等程度高的国家与转移及补贴占GDP比重大的国家在分布上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平等程度与高所得税率存在明显关联。

2. 建立先进有效的税收结构

有三个因素影响征税能力及财税收入社会分配的方式：税收负担、税收结构和逃税管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在这三个因素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问题。

拉丁美洲平均税负约为GDP的18%。无论从地区发展水平角度来看，还是就拉美政府为满足公共政策要求所需的资金而言，这一比率均属非常之低，这一点在前面章节已有述及。

该地区税负（包括社会保障）从1990年的12.8%激增至2008年的18.4%。在委内瑞拉、智利、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等国，来自自然资源开发的税收增长迅猛。尽管该税源得不稳定性远高于其他税源，但是在2008年使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税收提高至GDP的23.5%左右。加勒比地区的平均税收占GDP的26.3%。

该地区税收数额小，而且方式不科学：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税收是直接税，而绝大部分税赋属于消费税和其他形式的间接税⁴。因此，纳税后的收入再分配比收入初次分配更加不公也属正常。

由此可知，由于消费税大体相似，经合组织国家与拉美地区的税负担差距主要是因为后者实行低所得税和财产税税率。两者在公司税方面的收益相差无几（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仅超过GDP的3%），但所得税收益存在明显差距（在拉丁美洲仅占GDP的0.9%，而这一数字在经合组织国家则接近9%）。由于个人所得税是最先进的税收形式，可推知拉美国家的税收结构比发达经济体落后，因为前者对收入分配具有不利影响，也是导致拉美和加勒比成为全球最不平等地区的原因之一。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直接税收环节薄弱有两个基本原因：税基狭窄和逃税严重，两者均可归咎于该地区税收制度中普遍存在的优惠待遇和税收漏洞，这种制度税收支居高不下。在所得税方面，多数国家通过一系列豁免或特别待遇对金融投资、公债利息、投资基金收益、房地产及股票资本利得等资本收益给予税收优惠，许多情况下还对再投资收益给予更优惠待遇。

⁴ 在加勒比地区，间接税收入占总税收的比例也较高，但来自对外贸易税收方面的收入占比更高。

此类税收支出使税基缩窄、税制复杂化。此类制度不但是对公平——具有同等纳税能力的人应缴纳同等税额（横向公平），具有较高纳税能力的人应缴纳与其能力成比例的较高税额（纵向公平）——这一最基本要求的践踏；还导致资源配置中经济扭曲，削弱经济总体效率和该地区国际竞争力。

除税收结构落后以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还存在严重的逃税问题。拉加经委会通过大量研究发现该地区的逃税率很高，大约在40%至65%之间，造成的潜在税收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4.6%。高逃税率削弱了所得税的再分配效果。正如Jorratt所指出（2009），逃税对横向公平造成负面影响，因为逃税者最终比具有同等纳税能力并选择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缴纳更少的税款。

3. 公平分配的财政契约和社会契约

财政契约的必要性在于其赋予政府更大的资源再分配能力，使政府能够在推动社会平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社会支出及其来源即税费征收亟待改进，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尤其在税收结构方面）亟待提升。

财政契约的政治含义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税收或预算改革。财政契约要求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扮演的角色及推行的政策。财政契约的理念与发展规划概念的兴起密切相关，而发展规划则表达全面制定公共政策的愿望。因此，不满足于零星“小范围公平”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设计出可为全民创造公平环境的工具。关于平等的总体目标暗示多个行业取得实质进展。教育质量

和普及程度、社会福利的额度与覆盖范围以及政府对社会最贫困行业的财政行为能力将是收入分配必须实现持久增长的关键领域。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建立财政契约的条件业已成熟，因为这一概念已获得国际组织赞成，在国内行业和全国政治辩论中也赢得支持。制定和完善财政契约至少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公共支出被证明是对抗外部波动（就业率、收入和消费水平下降）不利影响的有力武器；其次，一套机制健全、管理成熟的强大税收制度被认为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团结和推动生产发展。

财政契约要求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不同利益团体之间达成共识，就此而言，其至少应包含以下要素：

- (i) 承诺逐步增加税负，适当刺激生产性投资以平衡税收制度。
- (ii) 政府改善税收的清晰路径，包括打击逃税并逐步控制逃税行为以及逐步取消直接税收豁免，从而增强公平性和提高效率。
- (iii) 按照事先约定分期实施税收结构改革，首要目标是提高所得税税率。
- (iv) 与税负及税收结构变革相关的共享平台，高税收将用于资助公共政策。
- (v) 一致同意且内容明确的公共议程，以便提高公共支出的透明度、提升公共机构的能力和改善公共支出的效果。
- (vi) 关于社会支出再分配的渐进计划，其中根据已知证据显示，在行业内部和各行业之间重新配置资源将对社会公平和生产率水平起到更大的再分配作用和外部效应。
- (vii) 考虑地区不平等并积极寻求趋同的税收结构和财政支出制度框架。例如，旨在确保税负在整个地区产生积极作用的地区团结基金或机制。

地区议程须可供多数公民查阅。决策过程必须以廉政诚信为基础，使不同利益得以顺畅表达，同时积极运用对话、谈判、协议等重要工具。以上措施旨在制定适当的公共议程，赋予具有活力的私营部门和广大公民有保障的权利以及行使权利的权力。

拉加经委会注意到社会团结契约的重要性（拉加经委会，2008），社会团结契约以普适、团结和效率为原则，努力巩固社会保障体系。契约必须包含明确的可持续规则，有效管理以及制度协调能力。契约必须允许公民参与其中并主张权利，下放权力，并且融合公共和私人领域。事实上，契约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创造公共收入、提高财政工作效率、增加公共支出透明度、保障社会公平、民主建设、创造就业、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和培训。

从根本上来说，平等契约是一份关于收入和其他资产再分配的约定，一份均衡地区巨大结构性差异的公约。生产率趋同是长期实现更广泛社会平等之基石，故而政府最容易实施的再分配手段依然是税收改革、税收制度和社会支出投向。政府要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政府必须在实现机会均等的同时减少在个人不同生活阶段、同一代人及各代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换言之，政府的参与标志着“公平效应”与“平等效应”之间的区别。

为加快确立建立社会契约，必须争取各政治和社会利益团体的支持。这意味着要营造一种有利于结成再分配联盟的文化氛围，以便安抚那些因再分配契约可能致其导致利益受损

而进行反对的利益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的是不但应保证政府落实相关措施的合法性，还应确保各种利益团体能够参与到再分配联盟之中。这些在社会上享有极高威望并拥护平等原则的利益团体包括：某种宗教的基层组织、慈善组织、工会、公民社会代表和团结基金会。此外，由于社会契约确定的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受益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税收，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福利及转移），所以中产阶级作为多阶级联盟的要员重要成员之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战略手段与建立利益团体联盟相结合是最近几十年实现发展的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Devlin与Moguillansky, 2010）。这些国家的成功见于以下方面：生产重组、增加出口、出口多样化、提高出口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以及促进平等。成功实现发展的国家制定的契约与本文所提计划相符，即社会平等方面的进步与战略方针立意要发展的生产能力以及就业和经济方面的进步息息相关。

以上建议旨在提出并重新定义政府角色：致力于社会发展、有能力进行资源配置和履行监管职能。为此，政府应代表制度、提高社会行动者（即公民社会）参与度，并且与社会建立新关系。社会契约需要并推动政治变革。这要求政府积极执政，完善合法性机制和代表机制，经济主体 广大社会利益团体积极参与议政，建立相关论坛。

社会契约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这个过程需要就长期共存计划展开讨论并达成协议，需要为共同福祉 发展动力牺牲

短期利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营造更美好的社会和更公平的政治环境。在这个框架下，必须重建政治合法性，因为内部民主和融入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乃至至关重要。

III. 拉加经委会愿景和长期挑战

当今发展面临着在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中探寻新方向的挑战与机遇。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融合进程为促进平等添加了新元素。今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和解决方案。目前解决问题的方式日趋多样化，而今天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最重要力量便是民主价值和重新设立地区政治趋同论坛的渴望——例如里约集团、拉美和加勒比一体化与发展峰会，从而制定更加一致的国家目标。例如在贸易方面，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以崭新和更加务实的姿态加强发展区域内贸易，以中间产品为基础打造价值链环节，而不是单纯争夺最终产品市场。我们还以国家联合体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市场。因此，在更好地应对经济波动、政治动荡和气候危机等威胁的过程中，多边论坛与合作非常重要。

本文开头曾提及结构变化，建议在市场自我调节模型失效后改变结构。然而某些发展必然与结构深度有关。危机影响将长期存在，需要我们立即着手制定决策并采取措施。目前，结构趋势如此明显，足以标志一场真正的时代变革已悄然而至。下面将阐述其中四个趋势。

首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与工业化的漫长历史以及二氧化碳高排放、化石燃料高消耗的生产模式密切相关，还与人类依赖自然繁衍生息这一特定关系密切相关。气候变化影响深远。若未能果断改变现状并就此达成全球协议，气候变化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多边主义是构架全球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和国家意志一样，若不希望所作的努力和达成的协议造成发展中国家永久不发达，新的“全球正义”不可或缺。

气候变化限制生产范式和消费模式并导致其发生转变。气候变化使代际团结成为平等议程的核心，甚至引发人类思考自身与自然界的相处之道。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每一个人的未来不可避免地与全人类的未来休戚与共。今天，面对全球变暖、环境破坏和能源危机，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在此背景下，为发展低排放、低能耗经济，应制定可选方案及限制措施。

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而言，气候变化或将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制约因素。若能审慎判断，着眼全局，气候变化则将成为一次机遇，该地区可利用这一机遇更新和改善基础设施、升级生产工艺、创造低排放高效率运输方式并逐步实现低碳发展模式。从社会平等和生产趋同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变或将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意味着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对社会最弱势群体而言公共服务是必不可少的福利手段。

第二个趋势是科技变革，即所谓的网络、信息或知识社会。科技变革并非关于仅仅作为提升全球竞争力要求的技术进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创新令社会日新月异，不断改变着经济和生产模式、工作和组织方式、通信系统、学习与信息处理过程、社会联系、政府形式以及行使民主和管理社会的方式。

网络体系倾向于放松管制及自我管制，但这给全球生活领域带来问题。众所周知，放松对金融、军火走私、劳工组织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管制将产生很大危害和风险。正因如此，网络自身应设法加强对全球生活领域的管制。由于缺乏管制，这些领域容易爆发经济、生产、环境或安全方面的全球危机。本文已探讨对金融体系和劳工制度进行管制的重要性。

第三个趋势是人口结构转变，其原因是不同年龄组别人口占总人口的相对比重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发生变化。尽管不同国家情况有所不同，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现正处于人口红利阶段，即儿童人口比重较小，尚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初期，这意味着目前该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相对被抚养人口比重较大。该地区必将在未来几十年中收获人口红利，以便为将来做准备。届时，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将造成劳动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相对减少。若要创造满足医疗和社会保障需求的资源，则社会生产力必须高度发展。

最后，人口结构转变将改变政府、市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以满足福利和能力建设需求。由于社会不同年龄组别人口的比例结构改变，需要对上述三者相互协调提供服务、财政支出和支持网络的方式进行重新评估。转移和看护服务是相互协调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⁵。目前，支持发展看护服务意味着促使更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由此扩大劳动人口基数，从而为日后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挑战做好准备。这种支持同时意味着确保儿童通过从早期教育至少到完成中等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取得进步，同时意味着对下一代劳动人口的生产能力进行投资。下一代劳动人口需要及早准备以提高生产力，因为随着被抚养老年人口的增加，其负担将逐渐加重。因此，发展社会保

⁵ 这方面另一个必须考虑的趋势是家庭安排变化和家庭 - 政府关系挑战。

障制度应以团结为核心：非缴费型养老金形式的公共转移对抚养老年人口将越来越重要，大部分老年人口未能持续参与到缴费型或个人资本化制度中。

第四个结构趋势是文化变革。全球联系越密切，人们越发意识到品位、价值观和信仰的多元化，但全球密切的相互联系有时会导致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不容忍，甚至演变为威胁全球安全的危险事件。柏林墙倒塌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民主集体主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民族冲突唤醒了集体暴力的幽灵。全世界消费及融资的增长赋予市场确定含义、身份和象征的重要职能。对许多人而言，通信与信息的全球化以及相关技术的大规模使用不断变换着时空隧道以及世界面貌。愿景，同时就偏好、人生规划和共存规范的变革步伐及深度提出问题。宗教认同的巩固与以现代性为特点的世俗化并肩发展。民族中心主义和父权制的基础因本土化运动和女权运动逐渐动摇。气候变化的威胁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与全人类共同居住的星球的相处之道。

文化变革质疑社会组织形式。例如，不可在未考虑青少年正在经历的激烈文化变革的情况下制定相关政策。性别与文化要素日渐成为平等政策的主流部分，并要求在机会平等与尊重差异之间取得艰难平衡。本文所提倡的核心价值——权利平等是政治行为的基石，因为它承载着普救主义者的天职，能够吸收并调和急速的文化变革。

有必要制定新型发展范式，即尽一切可能建立起一个全球化模型，该模型培养全球公共产品方面更强的集体意识；让全球治理这场露天音乐会的各位表演者自由表达声音，藉以在全

球唤醒民主；并且为边缘行业提供工具，协助其缩小能力、公民权利及享受福利的机会方面的差距。在全球化新模式下制定政策必须高瞻远瞩——但开始着手制定乃当务之急——从而在当今趋势所反映的气候、科技、人口及文化状况方面永远领先一步。

本计划旨在促成这一更为全球化的战略方针。

参考书目

- Afonso, Antonio, Ludger Schuknecht and Vito Tanzi (2008), “Income distribution determinants and public spending efficiency”, *Working Paper*, No. 861, 欧洲中央银行.
- Bárcena, Alicia (2009),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执行秘书在美国华盛顿10月5 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 (OAS) 第三十八届美洲讲座“寻找金融危机对策：采取的措施和未来的挑战”上发表的演讲。[在线] http://www.eclac.org/prensa/noticias/discursossecretaria/6/37526/2009-709CatedradelasAmericas_tradvf.pdf .
- Berg, Janine and Matthew Salerno (2008), “The origins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less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efence of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Cultivating Justi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anine Berg and David Kucera (eds.), Palgrave- MacMillan/ 国际劳工组织(ILO).
- Devlin, Robert and Graciela Moguillansky (2010), “Alianzas público— privadas para una nueva vision estrategica del desarrollo”, *Libros de la CEPAL*, No. 108 (LC/G.2426-P), 智利圣地亚哥，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联合国刊物，销售刊号No. S.09.II.G.152.
- ECLAC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2009),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09* (LC/G.2423-P), 智利圣地亚哥。联合国刊物，销售刊号 E.09.II.G.135.

- _____(2008),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08* (LC/G.2402-P), 智利圣地亚哥。联合国刊物，销售刊号 E.08.II.G.89.
- and the Caribbean* (LC/G.2335/Rev.1), Santiago, Chile, January.
- Ferraro, C. and G. Stumpo (2009), “Le PMI nel labirinto delle politiche”, *America Latina e Caraibi: una opportunità per le PMI*, Collana di Studi Latinoamericani. Economia e Società, 罗马，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意大利 - 拉丁美洲研究所 (IILA)
- Ffrench-Davis, R. (2005), *Reformas para America Latina: despues del fundamentalismo neoliberal*, 布宜诺斯艾利斯，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 Siglo XXI Editores.
- González, Ivonne and Ricardo Martner (2010), “Del sIndrome del casillero vacío al desarrollo inclusivo: buscando los determinantes de la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en America Latina”,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2010年1月26-29日于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十二届财政政策区域研讨会文献。
- ILO (国际劳工组织) (2004), *Economic Security for a Better World*, Geneva.
- Jorratt De Luis, M. (2009), “La tributación directa en Chile: equidad y desafíos”, *Macroeconomía del desarrollo series*, No. 92 (LC/L.3094-P), 智利圣地亚哥，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联合国刊物，销售刊号S.09.II.G.78.
- Tokman, Victor (2008), “Flexiguridad con informalidad: opciones y restricciones”, *Macroeconomía del desarrollo series*, No. 70 (LC/ L.2973-P), 智利圣地亚哥，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联合国刊物，销售刊号S.08.II.G.83.

